

/ 国 / 外 / 马 / 克 / 思 / 主 / 义 / 与 / 后 / 马 / 克 / 思 / 思 / 潮 / 系 / 列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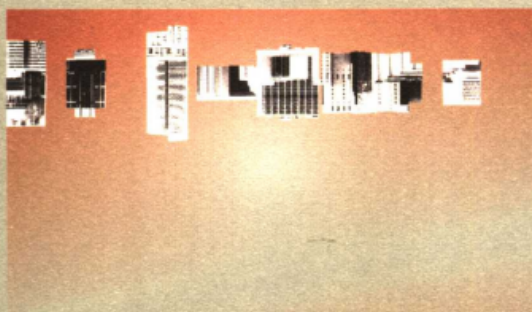
当代

学术棱镜
译丛

丛书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 宪 周晓虹

希望的空间

[美]大卫·哈维 著
胡大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一本鼓舞人心的书,行文流畅,插图优美……我希望这本书将有助于改变我们社会生活的道路。”

—Region Studies

“一项较大的学术成就……作者坚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等待着人们去奋斗、去创造,正是这个信念激励着他完成了这项成就。”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研究城市状况的学生应该感激哈维,为严谨且富挑战的治学态度、富有想象的创造力而感谢他。”

—Urban Studies

几个世纪以来,乌托邦运动都试图去构建一个公正的社会。大卫·哈维研究了乌托邦的历史,对它们为什么失败,以及在它们之后还能提供什么样的思想进行了思考。他对现有城市环境的全然描述(巴尔的摩是他研究的个案)推动了他的论点,即:我们能够运用而且必须运用乌托邦想象的威力来对付表示“没有选择”的所有人。他概述了一个新型的乌托邦思想,他称之为“辩证的乌托邦理想”,并使我们再次重新关注这样的可能性方案:设计一个与自然更加平等地工作和生活的世界。他认为,如果任何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或计划想要发挥作用,那它就必须考虑到我们人类的特性、与生俱来的能力和变化的动力。最后,大卫·哈维在附录中勇敢地勾画出一幅真正的个人乌托邦景象,清晰地阐明了他自己的希望地理学。

大卫·哈维 纽约研究所城市大学著名的人类学教授。他以前曾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地理学和人类学教授,及牛津大学的霍尔福德·麦金德地理学教授。他的著作包括《社会正义和城市》(1973)、《资本的界限》(1982)、《城市经验》(1989)、《后现代性的状况》(1989)、《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1996)和《资本的空间》(2001)。

责任编辑 蒋桂琴
装帧设计 赵秦
责任校对 夏娟

ISBN 7-305-04542-X/B·349

定价:42.00元

ISBN 7-305-04542-X



9 787305 045424 >

南京大学学术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主编 张一兵 副主编 周宪 周晓虹

-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后马克思思潮系列-

希望的空间

[美]大卫·哈维 著

胡大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望的空间

[美] 大卫·哈维著; 胡大平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7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ISBN 7-305-03861-X

I. 希... II. ①大... ②胡... III. 希望的空间 IV. C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7324 号

Spaces of Hope

© David Harvey, 2000

Reprinted 2002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by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 10-2004-119 号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希望的空间

[美] 大卫·哈维 著

胡大平 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发行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

电话 025-83596923 025-83592317 传真 025-83328362

网址 <http://press.nju.edu.cn>

电子信箱 nupressl@publicl.ptt.js.cn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涂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20 字数 348 千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305-04542-X/B·349

定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销售商联系调换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总 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的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化决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光谱。丛书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近的发展,尽力揭示域外学术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件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作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

致 谢

本书广泛选取了大量已在很多地方发表(或即将发表)的资料。包括:“阶级力量的地理学”,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98, 49—74;“质疑全球化”, *Rethinking Marxism*, 8, 1996, 1—17;“作为积累策略的身体”, *Society and Space*, 16, 1998, 401—21;“关于环境正义的思考”,即将出版于Low, N主编的*Global Ethics*中,Routledge, London;“乌托邦的空间”,即将出版于Bowers, L., Goldberg, D. 和 Mushenyo, M. 主编的*Between Law and Society*中, Minnesota Press;“马克思主义、比喻和生态政治学”, *Monthly Review*, April 1998, 17—31;“反叛规划的边界”,即将出版于*Plurimondi*杂志。我要感谢这些出版物的编辑和介绍人,感谢他们的有益评论。我还从“后现代性的作品:全球空间中的身体”一文中选取了一些材料,这篇文章最初投给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后现代性研究计划”。另外,我还有幸从各种机构中获得了相当大的反馈意见,如在佩鲁贾召开的有关城市替代方案的有影响的研讨会(由 Leonie Sandercock 和 Dino Borri 组织)、巴塞罗那 Tapies 基金会组织的长达一周的讨论会(特别要感谢 Noemi Cohen)、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司法研究中心及俄勒冈大学人文中心的谈话,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无法一一列举。个人、小组和听众对研讨会、会谈、演讲和讨论所作的反应对形成我的思想非常重要,我要感谢参与这一过程的所有人。

当然,有一些人以更加独特的方式给予我帮助。Cindi Katz 和 Neil Smith 的支持是惊人的。很多不同的人促成了(我想常常是不知不觉地)我对某些特别主题的思考。这包括:Jonathan Lange, Bertell Ollman, Peter Gould, Neil Hertz, Bill Leslie, Mark Blyth, Emily Martin, Katherine Verdery, Reds Wolman, Erik Swyngedouw, Andy Merrifield, Melissa Wright, Haripriya Rangan, Jean-Francois Chevrier, Brian Holmes, Masao Miyoshi, 以及霍普金斯大学一群杰出的学生(既有研究生也有本科生),特别是辛苦工作从而使城市和大学中的最低生活工资运动得以直接存在的那些人。我特别要感谢 Mark Damien, 他帮助甄选了本书中的一些插图。我还要感谢爱丁堡大学出版社的 John Dav-

ey,感谢他的编辑智慧和鼓励。我希望他在新的事业中一切顺利。最后要感谢Haydee 和 Delfina,他们总是帮助我确定对生活 and 爱的特别看法,这使得我能够忍受著述中的通常困难。

图片致谢

- 图 3.1 这是一幅视图,由 Penny Masuoka 和 William Acevedo 提供,这两人分别工作于 UMBC, NASA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和 USGA, 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
- 图 8.17 “理想城市的景象”的复制得到了巴尔的摩 Walters Art Gallery 的许可。
- 图 8.18 承蒙牛津大学 Bodleian 图书馆的同意,从 1518 年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中复制。
- 图 8.23 巴黎柯布西耶基金会 ©DACS 1988 和纽约的“都市生活保险公司档案”。
- 图 8.24 获得了©1999 亚利桑那州斯科特斯德的弗兰克·劳埃德·莱特基金会的许可。
- 图 8.25 “多塞特的庞德伯瑞”的复制承蒙康沃尔公爵领地的同意,由 Mark Fiennes 拍摄。

译 序

按照哈维自己的解释,《希望的空间》(*Space of Hope*, 2000)的标题与雷蒙德·威廉斯的《希望的资源》(*Resources of Hope*, 1989)相呼应,它代表着与马克思主义直接相关的左派乐观主义理论。这种乐观主义相信,“在历史的这一时刻,我们有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需要通过实践一种理论的乐观主义来完成,以便打开被禁锢已久的思想的道路。”¹而在更深的历史语境中,作为一种知识学立场,这种乐观主义长期与乌托邦想象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例如,这本书的标题便直接类似于埃比尼泽·霍华德的《明日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 1898),而内容上,它们亦可并入同一种知识传统。后者代表着百年之前通过城市规划对“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的卓越探索,而《希望的空间》同样从空间入手来谋划“每一个作为类成员的人完整地享有尊严和尊重”的可能性。虽然时代背景有着重大差异,但在确切的意义上,这两本书无疑都从属于十分引人注目的乌托邦传统,这种传统致力于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

大卫·哈维(Harvey, D. 1935—), 1960年以《关于1800—1900年肯特郡的农业和乡村变迁》一文获博士学位,次年从布里斯托尔开始其教学生涯,其后一直作为职业地理学家在大学任教(20世纪70年代后长期就职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其全部研究历程来看,他写出一本乌托邦色彩的著作并不难理解。不过,在今天,当我们的社会想象被科技主宰并服务于似乎自主发展的科技以及推动它的资本利润时,哈维以一种出其不意的姿态向早期乌托邦想象的回溯(在本书附录中对那个虚构的“埃迪里亚”的描述),带给我们的可

¹ 原书第17页,本书第16页。

能不仅仅是一种意义：震惊？反讽？或两者兼有？

近百年来，由于中国独特的历史，对民族未来的思考始终占据着知识探索的焦点。不过奇特的是，我们的未来想象，很少在严格意义上的乌托邦立场上进行。这可能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较为显著的是，无论是采取追赶型现代化道路（这意味着对西方现代性的直接模仿），还是采取跨越式现代化道路（这意味着对西方现代性的拒斥），乌托邦都是被排斥的，对于前一种道路来说，它是坐着说话——不腰疼，对于后一种道路来说，它是旗杆上挂地雷——空想。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后，“乌托邦”这个术语一直是在贬义上被使用的。这意味着，在我们的学术中（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谈论乌托邦总是要冒一定的风险。

因此，在我接触这一著作时便产生这一疑问：在今天中国学术界，我们是否需要一本这样的著作？在译文付梓之际，谈谈这一问题，希望不是滥用做译序这种权利。

二

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曾经断言：“知识分子”一词乃是一声战斗的号召，它的声音穿透了在各种不同的专业和各种不同的文艺门类之间的森严壁垒，在它们的上空回荡着；这一个词呼唤着“知识者”传统的复兴（或者，可以说，这一词唤起了对于这一传统的集体记忆），这一“知识者”传统，体现并实践着真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这三者的统一。¹当然，在今天，讨论知识分子话题的时候，诚如鲍曼所直接言明的，我们必须首要面对在现实层面上围绕被称为“知识分子”那一类人的多种对立：首先是他们与其他社会阶层的对立（如工农兵学商），接着是按照分工所设置的学科进行的划分（如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再就是学科内部的因知识立场和政治姿态差异进行排队（如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等），还存在一系列在理论细节上具有明显差别的小团体（如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与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等）等等。在上述每一个层次上，我们都会遭遇到认知（真理）、伦理（道德价值）和审美判断方面的差异甚至对立。

1 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

当代,由于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以差异性、异质性和多样性为核心的后现代主张对知识分子所产生的难以抗拒的吸引力,上述对立更加复杂。不过,社会发展(无论在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层次上)都有其自身的辩证法,当对立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弥合、缝合或综合这些对立便不仅仅作为一种知识难题、价值难题和政治难题而存在,而且往往成为一种实际趋势。

在上述趋势中,以公共文化重建为旨趣的激进乌托邦思想再次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这个话题曾经在 20 世纪 60 年代塑造出一群受人敬仰的形象和一种激奋人心的文化,但由于过于苛刻的边缘化策略和拒斥与主流对话的姿态,它不仅没有实现自身对世界进行强制性干预的目标,而且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双重衰落过程中流产了¹。20 世纪 90 年代,当然与 30 年前有着重大的历史差异,激进乌托邦的复兴亦因此具有不同的意味。对于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需要专门的讨论。在这里,仅仅指出的是,从整个知识分子文化来看,新的激进冲动已经被纳入总体的“文化转向”背景中,这意味着改造世界的冲动已经演化为改造话语的冲动。由是观之,作为一个知识难题、价值难题和政治难题,弥合、缝合或综合立场,本身是借由知识实现的并且往往局限于知识圈。对于这一现象,下结论似乎尚早。不过,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的焦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在一种文化的危机之中,文化理论本身就具有暧昧的特征,它在直接的意义上亦是那种危机的征兆。以詹明信为例,他的言说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正在走向崩溃的消费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但由于它并不占据也不能胜任改善既有社会结构或者催生潜在可能社会结构的核心力量,因此其激进姿态在直接意义上能够对知识分子的愤世嫉俗推波助澜,却不能抗拒采取相反综合立场的吉登斯所产生的辩护吸引力。因此,当代激进乌托邦仍然面临着独特的难题。

在全部激进乌托邦思潮中,大卫·哈维是比较醒目的一位,也是容易被误解的一位。说他醒目,关键在于,在人文地理学与激进政治学中间的位置上,如此之久(30 多年)地坚持在乌托邦与现实运动之间的接合,以一种显著的方式避免了上述激进乌托邦的核心局限;说他容易被误解,那是因为不仅在理论上,其平实的综合视角,对于激进主义来说可能不够惊世骇俗(如缺乏德里达

¹ 在 20 世纪,激进乌托邦的基本目标无疑是从马克思关于“改造世界”的宣言中演化出来的。但反讽的是,激进批判似乎只能通过解释世界而为世界本身的自我维持提供某种资源,理论总是背弃自己“改造”世界的冲动。这一现实具有理论和实践多方面的原因。但在总体上,这一现实与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双重衰落之间的互动关系亦是一个极为显著的现象。

那样的轰动和詹明信那样的诱惑力),而对于实证主义来说则又难以接受和理解(如缺乏吉登斯和哈贝马斯那样的在不同知识话语之间的协调能力),并且确实也已经发生,如他自己十分看重的《资本的界限》(*the Limits of Capital*, 1982)受冷落,而《后现代性的状况》(*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1989)则因其主题被追捧。

《希望的空间》出版于2000年,这一年被称为千禧年。或许因为过去太多的苦难,这个新纪元的标志激发了全球不同种族和肤色人们的狂欢情绪,从巴黎到北京,从纽约到里约热内卢。由于这本书的标题也谈论“希望”,似乎哈维亦加入了这种狂欢的大合唱,然而,他一开始就谈论“归来的马克思”(本书第一章)。对应于共产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惊扰,马克思长期被视为现代性理论和知识的一个令人烦恼的幽灵。20世纪90年代苏联和东欧剧变以来,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在现实和理论层面对共产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做的宣判曾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吸引力,使许多人相信幽灵被驱逐了。在这个时候要求根据《共产党宣言》在理论上重新定位当代的政治斗争,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哈维此举似乎有点“另类”。然而,这种“另类”的举动在他全部著述历程中并非第一次。1984年,当左派所称的“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之汉撒同盟”急剧推动全球自由化高潮兴起之际,他提出了“人民地理学”主张。这一次,他只不过再一次以地理学家的身份来谈全球化的潜台词——资本主义不平衡历史地理发展所推动的灾难及其替代方案。

在哈维看来,《共产党宣言》蕴含着丰富的空间(地理学)思想,这些思想能够有效地解释当代世界的历史地理变化特征。在多年研究基础上,在《希望的空间》中,他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作为中轴来分析当代全球化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后果,并且以此作为提出一种更加普遍化替代方案的依据。

暂且不论这个主题如何构成哈维30年教学和研究经历的中心,也不论它如何占据着当前激进左派的理论焦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在前苏东的大规模失败和资本主义在全球的长足发展,在今天谈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面临着诸多难题。其中核心问题之一便在于如何定义一种普遍化的理论基础。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人们倾向认为传统的以历史主义为内核的普遍性声张已经失效了。例如齐泽克曾经这样断言,在历史主义理论内部发生的无休止的争论,它们的主题也正是非历史的意识形态封闭性的形式:通过聚焦于本质主义—偶然性这样的简单对应物,聚焦于从一极向另一极的过渡,它混淆

了作为社会的全球结构原则的变化的具体历史性。¹当然,如果这个评论是中肯的,那么这也不意味着简单地转向偶然性、差异等立场的后现代主义就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在当代左派中存在着广泛争论,需要认真讨论。就哈维来说,虽然他并没有直接卷入这种争论,但从其长期的研究路径来看,他面对的确也是这个普遍性基础问题,只是与传统左派的历史偏好相比,他坚持的是地理视角。例如,他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Justice, 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1996)已经给我们提供一种宏大的抱负,通过在话语层面重新解释辩证法来沟通理论与实践、结构与过程、个人与社会,从而为当代激进思想提供一个以空间(城市)为落点的普遍性方案。

在本书中,他深化了自己长期有关资本积累过程的研究,在全球化规模上把身体(body)和政治人(political person)确立为当下普遍诉求的基础,以人的(劳动和生活)尊严的普遍权利为中心来设计乌托邦想象的基础。这一做法,既明显地深化了他在《资本的界限》中发展出来的以使用价值(空间生产、环境变迁)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批判思路,又充分地照顾普遍人权对激进思想的潜在价值,试图从资本生产的过程来解决乌托邦和反托邦双重后果的对立——前者是以开放性和可能性为中心的人类解放前景,后者是以物化和等级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统治现实。²与一般的激进批判相比,哈维极大地对那些以最低工资、劳动尊严等核心价值为依据展开的现实运动进行了概括,这具有相当大的朴实性;而与那些满足于特殊目标的理论和运动相比,他对辩证乌托邦思想的追求又具有极为明显的理想性。他的中心便在这两者之前进行协调。

与以深刻性、新奇性见长的那部分西方激进思想家相比,哈维的这种综合风格可能并不能立即获得国内学者的认同。因为,与其说他以独特的空间视角提出某种创造性弥合传统分裂的思路,倒不如说他只是以某种顽强的乌托邦冲动来阻止社会的快速堕落与恶化。在这一意义上,其对资本主义进行替代的乌托邦(如“可能的城市世界”)战略选择似乎只是一个地理学家努力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的冲动。正是在这一点上,虽然其理论视野和政治抱负比19世纪末埃

1 朱迪斯·巴特勒等. 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 胡大平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13

2 反托邦,原文是 *dystopia*, 是人们对奥威尔《1984》等小说类型的概括用语,因其意与乌托邦对立,又被称为“反乌托邦”。在哈维的文本中,从空间角度来描述资本积累与阶级斗争态势所共同塑造的多重社会后果时,他亦使用了多个相关空间术语,如源自福柯的“异托邦”(heterotopia),以及表示封闭和排他的“私托邦”(privatopia)等。

比尼泽·霍华德和20世纪早期的刘易斯·芒福德等人要开阔¹,但亦在总体上延续了他们通过理论干预现实促进其渐进改善的知识传统。这使我们看到,在本书的“附录”中,哈维以非常显著的早期乌托邦风格对他称为“埃迪里亚”的未来世界的描述,通过防御性激进姿态迫使人们把自己的眼光从当下的物化中抽拔出来投向可能的未来,从而告别在今天普遍感受到的“恐惧、紧张、焦虑、过度疲劳和无眠的长夜”。这个立场确实能够在绝大多数全球激进知识分子那里读到,但是像哈维这样长期致力于在不同的对立面之间进行调解,既顽强地保留乌托邦冲动,又不仅仅流于理论的批判,亦不多见。

三

综观哈维的著述,他占据着地理学与马克思政治经济批判的交集,在旨在改进当代人类状况的社会理论运动中,以顽强的乌托邦姿态推动着地理学想象的进展。²但是,这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哈维研究的特征。因为,使哈维在学术界中声名鹊起的,首先是1969年的《地理学中的解释》。这本有关地理学科学方法论的著作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理学实证主义化过程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甚至被一些评论者视为新地理学的“圣经”。³对于这样一位在英美人文地理学革新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者来说,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具有个案的意义。也因此,在介绍、评论以及借鉴的过程中,首先需要阐明他的这种变化。

在哈维的评论者中,人们往往喜欢用“重要的逆转”(significant reversal)来定位这一变化。⁴这一变化发生在1973年,是年,他公开发表《社会正义和城市》(*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1973),逆转其早期实证主义倾向一跃成为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杰出代表。在其后著述中,虽然我们仍然也会看到实证主

1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家、社会理论家。1922年公开出版《乌托邦的故事》,以强烈的人文关怀著称于城市设计领域,并深刻地影响欧美城市规划方向。由于这一点,他被称为支撑着公共思想而不是私人学术的干预性知识分子的代表。其《城市文化》(1938年)、《城市发展史》(1961年)、《都市前景》(1968年)等著作有着广泛的影响。

2 地理学想象(geographical imagination),亦可译为“地理学想象力”。这一术语是哈维的创造,它受到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想象力”的激发。这一术语既表明一种已经形成的知识传统,又表明由那种传统所蕴含的在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论眼光或知识能力。当然,正如“地理学”这个定语所限制的那样,这种能力本身具有特定的空间视角落点。

3 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译者前言vi

4 Peet, R. *Modern Geographical Though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8. 74

义训练所形成的分析风格,但这种“逆转”或“颠覆”的意义却绝不能低估。因为,它不仅使空间研究溢出严格的地理学科并使之从属于更为宏大的社会理论,更重要的是,它彻底地否定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性质。正是这一原因,哈维虽然可以视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他本人亦多次强调这一点),但他的研究确实也不能简单以学科内部的挑衅性姿态来概括,而应与西方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宏大的理论变迁联系在一起。

作为一种人文社会研究,和其他学科一样,地理学最初亦是通过科学方法的建构来实现自身的科学化,并为人类地理(空间)设计提供确定性依据。《地理学中的解释》无疑代表了这种取向。但是,正如广义的实证主义社会理论受到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启蒙理性批判之釜底抽薪式打击,地理学亦在“传统理论”中走到它的边缘处:试图排除价值的中立科学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由于它顽强地抵抗这种不可能性而实际上倾向于把自身孤立于科学应有之义外。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地理学内部不仅已经出现了对“与社会相关的”(social relevant)地理学主题的研究,而且到70年代,相关性(relevance)甚至被用来衡量地理学家对分析和解决经济、环境和社会问题的贡献程度。这一变迁的实质与霍克海默所主张的从传统理论向批判理论的过渡一致,即从纯粹的逻辑形式走入更为宏大的社会历史实践中。1969年,一份叫做《反对面:激进地理学杂志》(*Antipode: 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在美国克拉克大学诞生,这标志着人文地理学之激进传统的形成。在这一地理学转向过程中,哈维起着重要的作用。其《社会正义与城市》的出版,非常明确地把“社会正义”引入并作为地理学研究的重心。这一倾向可以看作对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中结论的践履,在那一文献中霍克海默说:“思想家的活动的本质促使它去改变历史并在人们之间建立正义”。¹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转向中,哈维持续地为其注入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推动并代表着激进地理学向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进一步转向。

当然,实现上述贡献,需要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而这意味着在实证主义方法论方面训练有素的哈维必须脱胎换骨。这一过程是通过艰辛的马克思主义文本阅读来实现的。除了70年代初曾游学巴黎并接受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潮影响,最重要便是从1971年以来持之以恒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阅读,这种阅读不仅

1 霍克海默. 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 见:曹卫东编. 霍克海默集.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集团,1997. 211

为他游刃有余地以马克思主义姿态介入各个论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同时为他发现和填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空间研究的“空白”奠定了基础。而他阅读的最重要成果便是1982年出版的《资本的界限》,这本书再次实现一个“惊人的跳跃”(a startling leap)¹——从空间角度重构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这一成果构成了他后来研究的全部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因此也是哈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1985年,哈维同时出版《资本的城市化》(*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1985)和《意识与城市经验》(*Consciousness and the Urban Experience*, 1985)两本书,它们是有关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姊妹篇,它们共同的副标题是:资本主义城市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这两本书于1989年又删节修订成一本《城市经验》(*The Urban Experience*, 1989)。这两部著作所涉及的主题,正是哈维在准备《资本的界限》的过程中所关心的,阅读《资本论》帮助他解决了叙述的逻辑。然而,哈维并非简单地按照自己学术研究的自发路径向前走的,他的这个姊妹篇也是与其他理论的战略对话,在其中哈维自觉地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城市研究中的理论地位。一方面,1981年,两本与空间有关但都包含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论著出版,一本是吉登斯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另一本是桑德斯的《社会理论和城市问题》。这两本书无疑都主张空间的重要性,但是它们却有意无意地贬低城市或城市化问题在当前的的重要性。前者强调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城市不再是占统治地位的时空容器或者权力容器,民族国家替代它占据了这个位置;后者拒斥“城市化在理论上是一个特殊的分析对象”。更重要的是,它们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能胜任空间分析。这种姿态可能影响了另一个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家卡斯特,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他与哈维以及列斐伏尔曾被喻为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三剑客,然而在1983年出版《城市与草根(大众)运动》时,他便公开告别马克思主义了。这一理论氛围显然对哈维构成了压力。另一方面,《资本的界限》出版后,虽然这本书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但是令哈维不满的是,大多数评论者都忽视其核心贡献是将空间生产和空间构型作为一个积极的要素整合进马克思理论框架的核心(the core of Marxian theorizing)。²所以,哈维在这两部著作中,试图通过城市化的历史经验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性。在他看来,城市不是一个物而是一个过程,它并不独立于资本主义生产,因此城市化研究必须关注资本积累过程;劳动力、商品以及货币

1 Harvey, D. Reinventing Geography. In: *New Left Review*. Jul -Aug. 2000. 82

2 Harvey, 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xi

资本的变化流动；生产的空间组织和空间关系的变革；以领土为基础的阶级联盟之间信息和地理的冲突等等问题。正是从这些角度看，地理作为一种景观，它是具有某种特殊空间构型的人工环境的“第二自然”，这种“第二自然”是在资本的控制下生产出来的，因此直接体现了政治权力。

1989年，哈维出版了《后现代性的状况》。这是一本很难以地理学视角来概括的著作，虽然空间的维度（空间的生产及其体验）仍然构成其中心线索。事实上，这本书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深的历史底蕴把地理学想象植入到社会理论之中，从而为现代性研究提供一种方案。当然，更重要的是，哈维的全部讨论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操作的，他也为马克思主义在现代性这个论域中有所作为展示了一种可能性（不过，与《资本的界限》一样，这个方面仍然被大多数评论者忽视了）。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是，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体验，其核心在于时空体验，而它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历史地理发展之动力，以及文化生产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变的复杂过程之间重要的中介环节。这一论见是针对后现代主义及其研究的流行腔调而做出的，这种流行腔调在反对元理论、反对宏大叙事、反对本质主义甚至反对实在的口号下主张差异、流动甚至纯粹的个人感觉。对此，詹明信曾经做出反应，强调后现代主义是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¹。詹明信的这一论断激起了巨大的理论反响。不过，詹明信的研究仍然是概括性的，他虽然敏锐而准确地作出了判断，但其政治敏感性和学术的穿透力并没有详细的历史作为支撑。更具体地说，后现代主义文化形成的具体机制和过程在他的研究中并没有展示出来。哈维的《后现代性的状况》，其焦点便落在这里。

如果说《后现代性的状况》以一种宏大的视角重申了《城市经验》的基本论调，那么，由于它的实际影响，哈维将需要进一步夯实他在其中提出但并没有展开的元理论——在理论和实践、空间体验和空间生产之间的协调，并以更积极的姿态介入到当代政治话语的论争中。这一点，也正是他所反复强调的“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之马克思主义旨趣。1996年，他出版《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这标志着一种以地理学想象为基础的社会理论的诞生。在这一文献中，他基于话语理论重新定位了理论的功能，设定了以“过程”辩证法为中心的地理学想象的基本结构，在此基础上回答了时空之社会构造的肌理，并探讨了以正义和差异为中心的政治学的可能性和方向。这一文献在直接的意义上为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介入全球化论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四年之后，哈维

1 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